



建筑师

7



建筑师

7

6
2-2

建 筑 师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建筑师》编辑部 编辑

本刊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伯扬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吕增标 庄裕光 范守中 杨君武 晏隆余
徐 镇 彭一刚 喻维国

*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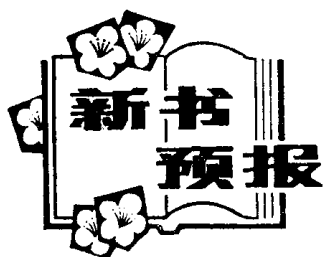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2¼ 字数：298 千字

1981年8月第一版 198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600册 定价：1.30元

统一书号：15040·4158





游 览 胜 景 古 建 诱 人

古建筑游览指南

《建筑师》编辑部编

许多人到一个新的地方，往往都想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而古建筑又是名胜古迹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哪些地方有些什么古建筑，他们的特点和历史价值又是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组织全国各地研究古建筑的一些专业人员，搜集各方面的资料，编写了一套《古建筑游览指南》，按省市分三册出版，共包括四百余处著名的古建筑。对每一处都以千八百字，两三幅照片加以简明扼要地介绍。本书不仅可起导游的作用，而且可以增长历史知识和建筑知识。总之，它可以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在意识上也可得到启发，是一套常备书。

第一册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古建筑百余处。预计81年6月出版，估价：0.80元。

第二册包括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古建筑约一百六十处。预计81年9月出版，估价：1.30元。

第三册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台湾等地的古建筑一百四十余处。预计81年11月出版，估价：1.00元。



本书收集了五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地23个国家97个博览建筑实例共计200页，以墨线图和照片为主，辅以简要文字说明。内容包括世界有名的博物馆、艺术馆、文化馆、纪念馆、画廊等平面、剖面和内景外观，对设计博览建筑有所启发。可供建筑设计人员、高等院校建筑系师生参考。

定价：二·〇〇元
计划八一年七月出版
梁鸿文等选编

博览建筑

——国外建筑实例图集——

杨廷宝素描选集

计划八一年底出版

估价：〇·七〇元

杨廷宝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二七年回国后，长期致力于建筑创作和建筑教育事业。他的绘画作品，构图严谨，画面和谐，明朗轻快，光影清新。这本素描选集收入作者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七九年近六十年期间所作素描，〇三幅，其中多数为建筑速写。可供建筑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美术工作者学习和参考。

童寯素描选集

计划81年底出版

估价：0.65元

童寯同志是我国老一辈建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早年留学美国，1930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建筑研究并致力于建筑教育和建筑创作。他的绘画作品风格或洒脱豪放，或绚丽严谨，色彩深厚，题材多样，给人以深刻印象。这本素描选集收入作者自1927~1930年留美和旅欧期间所作素描五十二幅，多数为建筑写生，其中八幅系彩色印刷。可供建筑工作者、高等院校建筑系师生、美术工作者学习和参考。

建筑师

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1年7月

《建筑师》编辑部编辑

目 录

从花园城市到社区发展

- 现代城市规划的趋势 香港大学 郭彦弘 (1)
- 国外大都市规划结构演变的几点主要经验 沈玉麟 (11)
- 谈卫星城 扈德睿 (18)
- 关于北京的旧城改造 吴焕加 (23)
- 天津市总体规划结构设想 天津大学 胡德瑞 (28)
- 现代城市规划名词术语浅释 尹培桐 译 (35)

试谈哈尔滨建筑风格 常怀生 (47)

哈尔滨建筑风格探讨 李德大 斯慎依 (55)

论风景区 张国强 (63)

风景区规划设计 桂林市城市规划局 李长杰 (72)

《梁思成文集》序 吴良镛 刘小石 (81)

《刘敦桢文集》序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 (85)

· 中青年建筑师园地 ·

顺应时代需要的新学科

- 节能建筑学综述 陈少明 张明宇 (87)
- 结构构思与合用空间的创造(上) 布正伟 (102)

· 建 筑 论 坛 ·

试论建筑学的方向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郑光复 (118)

· 建 筑 师 札 记 ·

建筑设计方案竞赛述闻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 童 寓 (123)

南行散记沉 石 (129)

· 国 外 建 筑 介 绍 ·

西方建筑正在向何处去?

——当代国外建筑思潮初探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刘先觉 (135)

评西柏林国际会议中心[英]兰普奈 著 左人 译 黄天其 校 (156)

· 译 文 ·

建筑师的社会责任

——关于提倡建筑、提倡规划、环境心理学、环境历史学和环境设计的札记

.....[美]多萝瑞丝·海登 著 李德华 译 (160)

1960~1980年美国的建筑、城市规划与环境设计理论的发展

.....[美]多萝瑞丝·海登 著 蔡晚英 译 华实 校 (162)

阳光与阴影

——一个建筑师的哲学

.....[美]马瑟·布劳亚 著 张迺苓 宋元谨 译 乐民成 校 (166)

功能、结构与美

——在英国建筑学会特别会议上的讲演

.....[美]埃罗·萨里宁 著 刘振亚 译 张似赞 校 (169)

建筑空间论(六)

——如何品评建筑[意]布鲁诺·赛维 著 张似赞 译 (178)

外部空间的设计(五)

.....[日]芦原义信 著 尹培桐 译 (186)

从花园城市到社区发展

——现代城市规划的趋势

香港大学 郭彦弘

编者按：本文作者郭彦弘教授系香港大学城市研究及城市规划中心主任。本文是郭彦弘教授应本刊特邀撰写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历史而来，不是演进就是革命。因此，要理解和断定这门学科目前的研究目标，似乎应该看一看城市规划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弄清楚目前的状态之后，我们才可以判断是否应该有改变；若有改变，又应该作哪些合理的改变？

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介绍欧美近年来城市规划在理论上的发展。希望通过对理论发展的分析，了解每个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实施上的可能性和困难。我想回顾一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今天，城市规划的发展趋势。

我将尝试描述一下每个阶段中规划思想的特征，然后我再分析一下这些变化的一些特点，从而找出其对未来的影响。不管有没有固定的方向——我的目的是评价一下规划观念和规划实践的演进过程。然后，看看这种趋势对现在和未来有关规划的教育和实践会有什么影响。

一、传统市镇规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六十年代中期，英国、美国和东欧的城市规划者主要遵循三种学说：埃比尼泽·霍德华（Ebenezer Howard）的“花园城市”概念^①，沃尔特·克里斯特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方”理论^②，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和赖特（Wright）的“雷德伯恩（Radburn）方案”^③。所有这些学说，都是首先描绘出一个理想的城市规划，然后再通过建设的规划定出办法和准则。

霍华德（Howard）“花园城市”概念主要是确定职业与居民的正确关系。确定理想的环境素质、土地使用模式以及城市的财政行政与城市的最优规模之间的关系。

克里斯特勒（Christaller）“中心地方”理论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城市。它研究的是在各类规模的城市中，公共服务与居民的关系。如果把若干个城市看成一个系统，就研究它们的级别与规模两者之间的量的关系，然后把城市按规模排成等级关系。

雷德伯恩（Radburn）方案，是以“中心地方”理论为基础，以公共服务（当时只用小学）来确定一个社区。也就是说，分享同一级公共服务的居民组成同一个社区。这种方案还把安全、康乐及环境看成是理想规划的重要因素。因此交通上它把行人和车辆完全分隔开。

在这一个时期，英、美、东欧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常常与新建设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新市镇计划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国家的规划模式大致相近，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各地都面临重建问题，特别是重建在大战中被大部摧毁的旧城市。战后各国都在

着手发展工业，从而直接带来了高速度的城市化。重建旧城市固然必要，但是还必须发展新的城市来容纳新的工业和附属的劳动人口。当时，城市规划者相信，只要有了形态建设规划（Physical Planning）^④就足以解决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方面的种种问题。城市规划被简化为形态建设方面的东西。他们认为，只要有了良好的物质环境，其他的社会问题就不会发生。此外，当时的城市规划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中各种不同的居民和集团，都会接受同一种价值观（Value System）^⑤。许多年以后，社会批评者和规划者才认识到，当时的这一种价值标准实际上只不过是规划者自己的价值标准而已。

虽然，莫里斯·布罗迪（Maurice Brody）对“形态建设决定论”（Physical Determinism）^⑥的批判，在当时已逐渐为人们所认可，但在实践中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城市规划就展示了新城市、城市重建计划、公共建筑、城市道路等引以为骄傲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形态建设方面的，立即可供使用的，主要是城市建筑的方案。在发展中国家中，前十年（六十年代）的城市规划被公认为是成功的。由于没有先例可供比较，人们主要是由形态建设的成果和规划所宣扬的东西来衡量，因而认为是成功的。但人们却往往忽略其使用功能，也没有顾及其提供的社会服务是否充分。另外，由于大规模的建设需时甚久，在规划初期出现的误差很容易就可以被纠正或避免。

直到今天，在公众的心目中，在专业人员的业务中，甚至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城市规划仍然是按照这种观念进行的。虽然城市规划的理论、方法、程序，多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的创新和改革，但形态建设规划（Physical Planning）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比较简单，因而始终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实行。形态建设规划的成果总是大规模的，因此大规模的建筑设计，差不多成了城市规划的同义词。在美国和英国，城市设计（Urban Design）^⑦已变成了一门

新学科，城市设计就是讲建设方面的设计的。

在这种概念指导下，规划程序（图1）是一个推理式的决策过程。规划者首先对整个计划的条件、脉络进行调查和分析，定下目标，找出原有的资源及已有的建设项目，然后制出一个总体规划（Master Plan）。总体规划其实是土地使用模式的远景计划，具体地列明各项基本的、重要的建筑。这个总规划将通过一系列的公开聆听（Public Hearing）^⑧，有关的居民和机构在审阅后发表评论、批评。规划部门再根据他们自己的考虑加以重订或修改，经采纳后便付诸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很少。在发展新城市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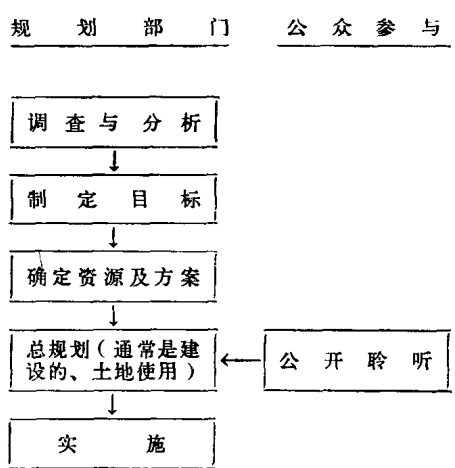


图 1 市镇规划的程序

民体还不存在，通过公开聆听得到的公众反应是非常有限的。

二、区域发展

六十年代，法国学者集中研究区域发展，美国学者随其后。法国学者所关注的是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注意增长率在水平之下的区域。理论上，规划者研究的是核心(Core)

城市与其外围 (Periphery) 地区的重要关系^⑨。核心地区与其势力范围, 在功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交流和联系, 是决定那个区域兴衰的一个因素。于是, 关心落后区域, 关心区域性的增长, 变成了主题。换句话说, 城市规划可以被当作一种肯定的战略方针, 用来激发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的多元化。

“增长极核”理论 (Growth Pole Theory)^⑩ 认为, 在特选的极核中密集投资, 可以激发整个区域的增长。这个理论被当作区域发展的原理而被广泛地用作落后区域发展的基础。由于侧重区域发展, 规划者从侧重建设规划转向侧重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它也把规划者的眼界从市镇或城市扩展到大区域的规划。区域发展的理论有着世界性的影响。除法国及前法属殖民地以外, 土耳其, 拉丁美洲, 著名的英国“东南研究计划” (Southeast Study), 苏格兰的发展如坎伯诺得 (Cumbernauld), 英国中部第三期新市镇, 美国的河流流域研究, 都采用了“增长极核”理论来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发展规划。

由于学科上的原因, 美国的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研究城市发展和区域发展的探索过程中, 研究了种种方法和技术, 因而发展出一门称为“区域科学” (Regional Science)^⑪ 的学科。区域科学的基础, 是地理学 (特别是“地理区位理论”) (Location Theory)^⑫ 和城市及区域经济学。他们很注重方法, 因而采用了许多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 的技术手法。采用了系统分析 (Systems Analysis), 运筹学 (Operation Research), 博弈论 (Gaming) 及大型模拟技术 (Large Scala Modelling)。他们运用电子计算机造出了大型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模型, 作预测及探索研究之用。他们还发明了一些简单而有用的模型, 在交通规划及经济规划中使用。

城区发展和区域科学对规划专业的影响, 在于提示了发展可靠技术的必要性, 以及意识到“区域”这个概念。也就是说, 城市规划不应只限于城市之内, 而应扩展到外围的郊区及农村。核心城市的经济基础 (Economic Base)^⑬ 与它的外围地区的生产活动紧密地联系着。它的市场、生产和技术, 直接影响着整个区域的生产的供求, 核心 (Core) 地区和外围 (Periphery) 地区之间, 任何一方的膨胀、萎缩, 都会放大性地影响另一方。核心地区或外围地区的生产活动的发展, 都在整个区域里面形成一个复杂的增长和衰落过程。因此, 城市规划局限在核心城市而置郊区及农村于不顾, 是讲不通的, 也是不合理的。在发展中国家, 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 城乡关系是很紧密的, 而且是处于变动之中。

作为一门学科, 城市规划已不再等于形态建设规划 (Physical Planning) 或者城市设计 (Urban Design)。城市的兴衰, 人口的迁移, 土地的需求和运用, 都有其经济上的成因。土地规划只是指导和控制土地的安排, 若不考虑经济上的需求, 土地规划本身就会无所作为。再者, 土地的运用和土地的价值, 在空间 (Spatial) 上是由经济原则来支配的。不管是宏观规模的还是微型规模的建设规划, 很明显都是由经济来决定的。由于侧重点从形态建设方面转移到经济和地理方面, 城市规划就步入了社会科学的范畴, 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

更重要的是, 规划者开始意识到, 若用控制性的措施去纠正不良的城市行为, 首先就要调查和了解其发生的原因。但是, 在城市规划本身的传统中, 缺乏分析城市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于是, 就要大量借用社会科学的成果, 城市规划变成了一门跨学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专业。要解释种种城市行为, 即使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 也会感到不足。要明白许多前人从未涉足的情况和关系, 就有必要进行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

由于有意识地推进理论性的分析和方法性的分析, 使规划变成了富有挑战性的学术研

究。逻辑性和合理性变成了城市规划中解决问题的重点，但缺乏的是人道主义（Humanism）^④的考虑，城市规划变成了高度技术性的东西，可以让专家在实验室中进行。公众参与意见则只会增加种种非理性的、人性的价值观和行为，而这些刚好是制定模型时为了照顾客观性而有意排斥的。规模的模型于是变得繁复而抽象。而且与实际的情况脱节。这样的模型，若摆到社会实际中去看，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就成问题了。此外，其中涉及的复杂性和技术性，需要大量的财源、时间、机械和人材。这些模型毫无疑问有其学术上及教育上的价值和贡献，但是规划部门在实际上很少能够有足够的技术人材和资源去运用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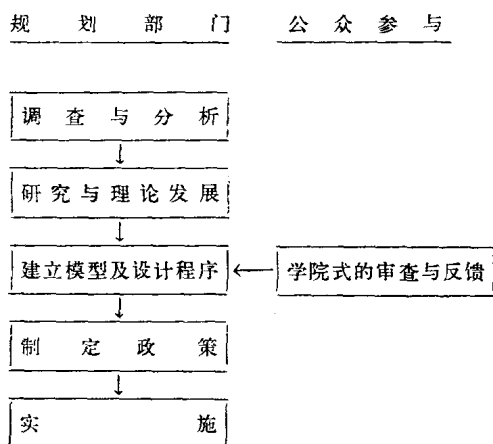


图 2 区域发展的程序

区域规划的程序（图 2），开始是正规的调查和分析，就象一般的合理性决策程序（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⑤一样。由于区域性行为的知识很少，在为一个特定的区域设计模型之前，通常要先研究出新的理论，从而建立假说。这样设计出来的规划政策，往往是复杂技术程序的产物，大多数的公众难以明白，更不用说评论了。这类模型、政策，通常只能由学术机构或研究机构来审查，只有它们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评估整个规划的确切性和准确性。由此而得到的反应自然与模型本身一样技术化，对公众来说一样是深不可测。这样的程序把规划的制定，局限于规划者

及学术机构的内部，由于规模比较大，通常不再经过公众审议就由有关部门或机构去执行了。

三、社 会 安 定

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美国（英国则在七十年代后期）的主要旧城市出现一连串的骚乱。当时的少数民族缺乏社会服务和经济出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导致了一些城市暴动。最引人注目的是1967年底特律城的事件。在英国，城市骚乱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强占城市空房又不交租金，还有公众对科文特加登（Covent Garden）发展计划的抗议。

这一类大城市中出现的社会政治性的问题，被认为是密集居住的都市生活的一种现象。民族分化，文化分化，城市政府的效率低能，社会沟通和交流的失效，都使城市这个“大熔炉”（Melting Pot）^⑥陷于崩溃，使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陷于瓦解。有人认为，这也是主要旧城市衰落的关键原因。后来，这类问题被称为城市内部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城市规划的首要问题，是社会的下层与企业及政府之间的对立问题。城市规划变成解决社会和政治冲突的一种手段，这种冲突以公众为一方，而以公共机构和私人企业为另一方。城市规划无形中把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各种形式的公正）当成一个准则。此外，由于它要处理的是城市社会中不同阶层的问题，所以抛弃了全面规划的概念；由于优先考虑社会政治问题，放弃了侧重形态建设规划的做法。

这个期间，出现了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的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⑦。规划者认识到，他们不能再忽略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的分歧性。因此，

他们必须选择服从某一种价值观。他们选择了与下层一起，为他们争取权益，推行他们的价值观。一方面成为他们（下层）的政治倡导者，另一方面又是为他们（下层）提供规划的技术员。城市规划现在在小规模的水平上进行，在城市级以下，以解决当地问题为本，着重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和社区环境。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规划的使用者以往被看成是委托人，群众是计划的受益者，而规划者则是为群众输送设施的职员。现在，规划者接受了使用者的价值观，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他们与群众一起工作，为群众而工作。怎样重新确定规划者与群众之间的功能作用，已成了城市规划的重大课题。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⑧认为，规划的过程，有一部分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规划者从群众处学习社会的脉络和价值观，群众则从规划者身上学习技术和管理。让双方交往，让两类知识融合，规划者可以与群众一起发展其规划。

于是，规划优先考虑的重点，从形态建设和经济的发展转向社会关系和社会策略。数据图表让位于文字的文件。城市建筑被制度（Institution）和立法（Legislation）所取代。城市规划已不再是有形的东西。社会学变得有用了，因为曾经被认为是非理性化的人性价值和人性关系，现在变成了城市规划的关键环节。政治科学变得重要了，因为人们感到，决策终究是在政治舞台上作出的，而在执行过程中又要靠各个政府部门的协作。要实施一个规划，需要群众的接受和支持，还要被公开采纳成为政府的政策。因此，对规划者和群众来说，一个规划的成功，要靠恰当地融合各种社会科学。

城市规划所考虑的空间单位和社会单位，已不再是城镇级，而是缩小成小于城市的级别。作为一个规划单位，区域太复杂了，规划出来不会有好效果。城市被分割成较小的空间单位，互相之间密切联系着。规划出来的方案，也只限于解决这些小单位内部的问题，和与邻近单位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同一个城市中，不同的规划者为不同地区的不同居民工作。由于各事其主，规划与规划之间往往有利益上的冲突。为了获取资源，使规划被采纳，倡导性规划者发觉他们往往会自相争斗。公共的规划部门于是担当了裁判的角色。结果是，建议的方案很多，真正动起来的却很少。规划者发觉自己很不自愿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而对于政治，他们未经训练，能力甚低。

规划的程序（图3）也起了剧烈的变化。不再由规划部门首先提出规划方案。社会上的骚乱和危机已经垄断了规划的优先课题。从这些课题中，规划者开始进行调查研究等技术工作，找出存在的资源，设计出专门对付社会危机的新项目，制订出可以遏止骚乱的策略。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有关的群众大幅度介入并提出意见，因而叫“民众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⑨。这些规划在各个社团实施时，这些社团将不断调节规划的进度，并将反映回送给规划者，后者据此来修订和改进原来的规划。规划者深知自己正在开辟新天地，建立新的条件，但他们同时也知道要实施这类规划是极端困难的。

传统市镇规划显然不足以解决现代的城市问题；区域发展的规划又太复杂而难以令人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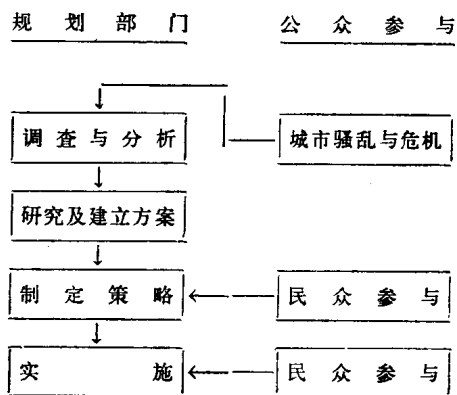


图3 社会安定的程序

白；而以倡导性规划出现的社会安定化规划，看来合理但不现实。城市规划于是面对一个学术的十字路口，一个紧要关头。旧的理论正在被重新检讨，被批判性地分析；新的理论和实践正在创建和经受考验。

四、社区发展

七十年代后期，大西洋两岸的学术界很不平静，人们要重新找出规划的定义，找寻发展的新出路。也是在七十年代后期，西方世界开始认识到通货膨胀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此外，美国的规划者认识到，虽然规划的空间规模被缩小了，学科研究范围却反而扩大了。有些规划者甚至走回头路，认为要进行有效的规划，还得回头再集中研究土地问题^②。

通货膨胀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有两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可供规划使用的资源锐减。原来的经费和项目都被削减。在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眼中，城市规划是经济领域中的一种限制性措施，它妨碍了市场活动的机动性。除了限制性之外，发展规划又被认为是一种吸取资源的措施，因为它将资源用到发展社会服务方面去了。他们认为，用以提供社会服务的资源，可以改用来为生产和市场提供服务，因而减少规划可以使经济发展的效率提高。

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影响，是城市失业率的增长造成的大城市人口外流。城市下层居民是城市失业现象的直接受害者。专业人员也受到影响，虽然其影响不如低收入阶层严重。城市失业率在大城市中日趋严重，人口开始流向较小的城市，甚至流向国外，主要大城市的人口逐渐下降，造成了新的城市内部问题。人口流失对于居民的收入、就业和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是放大性的（Multiplier Effect）^③，不断地加速着人口的下降。这些城市内部问题明显地影响着土地——造成城市内部许多低薪住宅的空置。下层居民的住宅区趋向瓦解。最惹人注目的例子莫如纽约市的South Bronx区。城市正受到骚乱的威胁。

在美国，“居住区复兴”（Neighbourhood Revitazation）^④已经是城市规划的重点课题。一般来说，这表示要逆转下层居住区瓦解的趋势。要稳住下层居住区，特别是最基本的社会服务，但社会服务本身并不能扭转人口的下降。要让居住区复兴起来，关键在于给居民提供经济出路。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货膨胀期间社会服务就会被削减。于是，经济发展成了增加就业，稳定社团的唯一途径。在美国，这叫做“社团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意思是在城市的贫穷居住区中，通过微型规模的经济发展来制造劳力需求。这里，规划的空间规模仍然是小型的。

在英国，社团发展的意思也差不多。它主要关注的是大城市内部的经济更生。它研究的是在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中发掘潜力，为城市贫民、少数民族和失业者提供职业。这种社区发展依靠私人机构的参与，但也研究当地政府如何鼓励私人参与。这样，贫困与不平就成了主要的城市问题，而为了减轻这些问题就试图创出新的政策以维持收入、提供津贴或降低费用，或实施优待。同时，这种社团发展也要对一些问题进行评价：出路不佳的工人对教育和训练的需要问题，社会服务的先后缓急问题，社会服务的授受途径问题。

不论在美国或英国，社团发展都假定社团内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安定是必需的，没有这些安定就无以维持整个社团结构。

显然，上述的社团发展，在实际上相信着某种价值观。长期以来，人们公认“为效率

(Efficiency) 而规划”应该是一项准则。现在又加上了公平 (Equity)。公平不单是一项准则,而且变成了规划者的标志。他们认为这种专业人员的责任,是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减少社会上下层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这里有一个假说,即既得利益阶层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在社团发展的规划过程中,第一个任务就是识别问题。在许多特殊问题还未经识别时,不公平却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且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作为一种补救性措施,规划的一大任务是发展资源。为了纠正或减轻不公平带来的社会病态,必须发掘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由于原有资源的紧张状态,补救性的规划有包括资源发展的必要。没有额外的资源,规划出来的方案就无从实施。表面看来,规划仍然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以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主。规划者不太象有自己的专门学科,倒更有点象社会科学家。不过这种情形仅限于在分析和识别各种根源和问题的阶段。到解决问题时,规划者又会回过头来以土地发展和建设发展作为他们的主要手段。分析了一个贫穷社团的劳力市场,也许会产生土地发展或进行建筑的方案。这些方案,或者本身已经会制造就业机会,或者建成后其中的活动会为该社区增加就业机会。由于规划不只要得出答案,还要付诸实施,因此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空间格局 (Spatial Pattern)、活动地点分布 (Activity Location)、土地立法及土地管制 (Land Legislation and Control)、建筑投资 (Construction Investment)、还有城市设计 (Urban Design)。

也许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里,城市问题的背景显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大城市,发生着的是人口膨胀而不是人口下降,强占住房的情况是由于房屋求过于供,而不象发达国家的城市是由于供过于求而造成的房屋弃置。虽说城市化问题的脉络显著不同,但规划的另外一些方面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许多城市社区的出路和设备在平均水平以下,这个不公平问题是到处一样的,所有的规划者都要进行补救性的规划,都要受到资源有限的压力,他们的任务是一样的。城市用地到处呈现需求的紧张,

规 划 部 门 公 众 参 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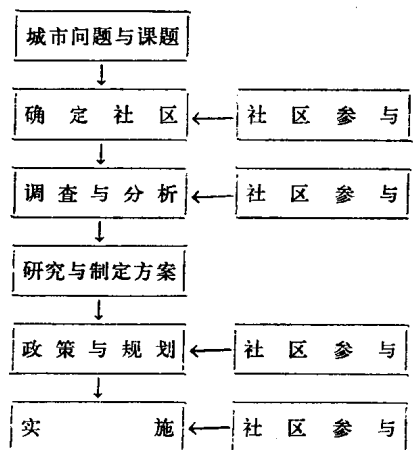


图 4 社区发展的程序

这又使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得不围绕着土地问题打主意。虽然城市问题的发展过程很不相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在许多规划的专案课题上是共通的。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社团发展的模式可以直接搬到发展中国家去,但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加以某些修改,谨慎而有选择地采纳,发达国家发展的概念和技术是可以应用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

社区发展的规划程序与其他程序区别很大(图4)。由于以公平作为准则来确定城市中的问题,规划者首先要确定城市中的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社团。规划者跟着会与社团居民一起决定解决的特殊问题。甚至在调查和分析的

技术工作中,社团居民都能看到并评论其成果,然后再进一步去发展资源,制定新方案。政策和规划都是由规划者和社团居民一起制定的。由于社团本身参与规划的过程,社团对订出来的方案就诚心地认可。换句话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方案。由于认可,社团就自然会协助去经营和实施这个方案。他们与规划者密切合作,把意见反映给规划部门,以进行修订、改进。

总结和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规划的途径已经经历过几度带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市镇规划时期，这个时期城市规划是根据一些规则（Precepts），为职业和生活提供一个社会设计的蓝图。这也叫做规范化规划（Normative Planning）^②。接着是区域规划时期。在这个时期，规划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法。为了平衡区域之间的增长上的差异，规划可以作为引发和加速增长的一种工具。这个时期，也是规划技术进展和进行大规模规划的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社会安定时期。规划变成为了防止或减少社会上的迷乱和骚动。下层社会成了规划者专心关注的目标。规划的规模缩小了。最后是社团发展时期，规划又再侧重建设发展，这种规划不受任何限制，但依据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和脉络。规划的规模大小已不太重要，但实施的规模则比较小。

回顾一下现代的城市规划，可以感到起码有四个方面的趋势。第一，规划者正越来越远离那种预见式的“乌托邦”型或“最终境界”（End State）型的规划。人们用“最终境界”来衡量现存的环境，希望通过改革现存环境来达到理想的境界。现在的规划越来越与群众呼应。它客观地找寻社团自己的需要，想办法以社团要求的标准去改进环境。规划者不只是由领导者的地位走向呼应者的地位，而且从设计新的理想社会，变为解决现代城市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实际上，城市规划已从空想主义（Visionary）走向现实主义（Realism），从因循教条（Precept）转为向社会负责（Accountability）。

城市规划的第二个趋势，是不再把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强加在规划上面，转而客观地接受社会的价值观。规划者现在承认，社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和经济力量是重要的，这些力量正是工作中的现实、条件和约束。而以往，他们是完全不理睬这些因素的。由于他们为社团而工作，与社团一起工作，这就迫切地需要一种密切的关系，来代替以往那种委托——被托的关系（Professional-Client）。看一看前面的四个程序图，就可以看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规划必须富于理想，并不认为需要向公众灌输道德标准。他们尽量抑制自己的价值观而把规划看成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讲得明白一点，城市规划已从主观的态度（Subjective）变为客观的态度（Objective）。

另一种趋势是城市规划已从单性学科（Unit-disciplinary）变为复性学科。（Multi-disciplinary）。由于规划要面对的是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社会问题，而又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中去找寻解决办法，它的任务，不管是居住区发展还是区域发展，都变得复杂得多。单性学科的队伍已不足以分析问题或解决问题。问题的错综复杂，要求要有一个复性学科的专家队伍，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这样，对问题的研究就会更加全面，解决的方法可以更深入地去探讨，整个分析也会更加完整。

随着城市问题的性质的变化，包括前后的变化和方案与方案之间的变化，显然这个复性学科队伍的成员也有所不同。作为与社团合作的伙伴，不同性质的城市问题将组织不同的社会科学家。于是，不同学科的专家的协作问题，就成了城市规划实践中的决定性问题。随着城市课题的越来越复杂，规划者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法而专业化——有些专注于房屋或交通运输，有些专门从事经济或社会分析，有些则专门从事方法论方面的工作，例如调查技术、计算机程序设计或模拟技术。规划的专门化，来源于城市课题的社会性质和复杂性。规

划从一元化 (Monism) 走向多元化 (Pluralism)。

最后, 规划在创立的时候, 是作为一种专业, 它掌握着所有的资料、知识和技术, 凭着这些去解决城市问题。现在, 它却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要找出可行方案, 首先要了解其脉络, 其价值观, 然后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才用得上。每一个专题都作为一个独特的问题来处理, 而不能套上一般化的解决方案。将恰当的知识选出来, 用上去, 正是规划的关键。在许多情形下, 现有的知识不足以解释问题或者不足以指导规划。从而, 规划往往就要作出一个假说或者假设一个合理的行为模式, 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这种方法, 使规划者对问题的研究能更深入更详尽, 并迫使规划者去认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还会迫使规划者到传统的学科以外去找寻更多资料, 找寻更深刻的领会。城市规划的学科, 正从“内在化” (Internalising) 走向“外在化” (Externalising)。

城市规划开始的时候是一门可以明确定义的学科, 逐渐而又正确地转变为一种可以弹性地阐释的专业。最简单明白地说, 现代化的城市规划趋势是由“硬搬” (Applicative) 走向“探索” (Heuristic), 从“肯定”走向“寻求”。

说了这一大堆,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 研究西方以至世界城市规划的过去与现在的成败及趋势是有助于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有群众参与, 城市规划是比较容易推行的。而外国的成败则与其经济系统、文化背景、人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目前重要的任务还在于要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的积累、人民的意见。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 先要有系统的调查、搜集城市经济、社会、行政和土地各方面的资料。还要把城市规划的部门组织起来, 同市政各部门建立一定的关系, 并且制定一套较简单、容易实施的规划程序。

中国现行的城市规划看来仍是采用传统市镇规划, 着重形态建设规划, 形态建设规划只是在建筑上下功夫, 而对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都还没有全盘考虑到。这种规划只是靠总体规划的蓝图来规划, 而远长期的蓝图又不可靠; 因为一旦有了政策、市政、经济上的改革, 整个总体规划就不适合新的形势, 原有的图就没有多大用途, 常常是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从外国的经验来看, 乡村的发展, 即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 特别是小城市的发展, 都是区域发展的一部分。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关系, 中国的规划者已经明瞭, 可是如果不注重这些矛盾的存在而盲目地发展城市, 就会导致畸形的外表,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 如何解决农业问题, 这和农村及附近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的互相影响。农村城市平衡发展是当前中国一个大问题。由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会逐渐地使农民转到工业中就业, 公社里的地方工业亦会逐渐扩大, 而公社则逐渐变为小城市, 这个趋势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村小城市化。大城市由于现有的工业基础, 有大的商品市场。在“四化”的过程中, 具有先进水平的工业就会“因地制宜”地在这些大城市里发展起来, 而大城市亦会随之自然地增加、扩大。

但是, 中等城市的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政策仍是一个大问题。“中心地方”理论特别分析大、中、小城市的关系。那么, 中型城市发展的政策, 是否可以“中心地方”理论为基础, 根据大、小城市发展的趋势, 客观地制定一套合理的方针呢? 这是另一个区域发展的问题, 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至于社会安定, 社区发展的一套理论, 有没有实际应用的地方, 则取决于实际的需要。在“四化”中, 民主化是十分重要的。因此, 在城市规划中, 群众的意见不仅重要, 而且应该被视为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规划的目的在于满足群众的需要, 所以在程序上也要把征

求群众的意见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步骤,深入群众的重要性需要在程序里面加以安排,而这一程序又是值得研究的。

这个结论,只是粗浅的提议,把用现代外国城市规划理论分析中国城市规划的问题的可能性提出来。当然,许多外国理论只是针对国外的情况和特征而言,并不能全套地在中国应用。不过,国外城市规划的成败、优缺点、理论与实施,对中国城市规划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程介明 译)

注释:

- ① Ebenezer Howard, 《明日的花园城市》(Garden City of Tomorro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0.
- ② Walter Christaller, 《南部德国的中心地方》(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6.
- ③ Clarence Stein, 《美国走向新城镇》(Toward New Towns for America),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7~74.
- ④ 形态建设规划:指建筑和建造方面的规划。内容主要有土地使用,建筑物,公园,交通及公共设施。
- ⑤ 价值观:指人们(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根据其预期的愿望、效用及素质而作出一套权衡事物的标准。商品或社会福利都可以体现人们的价值观。
- ⑥ 形态建设决定论:指城市规划者的一种假设,认为形态建设规划足以影响社会变化。
- ⑦ 城市设计:这是指对人工环境中的种种建设加以调节,并以此来适应公众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委托人的利益)。
- ⑧ 公开聆听:这是英国规划程序中的一个步骤。城市规划者将他们的规划公开展示并组织公众集会。在集会上公众可以发表意见,提出问题。
- ⑨ 核心城市和外围地区:有时也被称为中心商业区和郊区。
- ⑩ David McKee, Robert Dean and William Leahy (eds.), 《区域经济学》(Reg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Part III.
- ⑪ Walter Isard, 《区域分析方法:区域科学导论》(Methods of Regional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9, and William Alonso, 《区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⑫ 地理区位理论:这是由经济地理学家创出来的一套理论。他们首先研究工业的发展因素和一般行为,从而对区位问题作出详细的部署。
- ⑬ 经济基础:指构成整个基本(出口)经济的生产和服务。
- ⑭ 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主要关注人类的本质、特征和利益。
- ⑮ 合理性决策程序: Ration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Nathaniel Lichfield., Peter Kettle and Michael Whitbread, 《规划过程的评价》(Evalu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5, Chap.2.
- ⑯ “大熔炉”:在美国,人们常常称大城市为“大熔炉”,因为城市中聚集着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行业、不同国籍和不同种族的各类人。他们通过城市这个环境进行思想交流,互相学习,学着互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多姿多采的社会。
- ⑰ Paul Davidoff and Thomas Reiner, “规划原理的选择”(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 《美国规划工作者协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28, No.2, May 1962, P.103~115; and Paul Davidoff, “规划中的倡导性规划和多元化”(Advocacy and Pluralism in Planning), 《美国规划工作者协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31, No.4, Nov.1965, P.331~338.
- ⑱ John Friedmann, 《交易规划理论》(Retracking America, A Theory of Transactive Planning),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3.
- ⑲ “民众参与”:这是指市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公开征求意见,并采纳市民的意见以制定政策。
- ⑳ Robert Burchell, and George Sternlieb (eds.), 《1980年代的规划理论》(Planning Theory in the 1980s), New Brunswick, NJ, 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 1978.
- ㉑ 放大性:指几何级数式而不是算术级数式的增长减弱。
- ㉒ 居住区复兴:指提供种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援助,让已经崩溃的居住区重整旗鼓,使他们用双手重新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居住区。
- ㉓ 规范化规划:指按某种既定的规范来规划。在规划工作未开展之前,规划者已经有了某种目标,不过不一定显露出来而已。

国外大都市规划结构演变的 几点主要经验

沈 玉 麟

二次大战后，国外大都市面临严重困境，城市人口“爆炸”，规模“臃肿”，工业过度密集，公害泛滥成灾，城市道路交通拥塞，劳动人民居住环境恶化。其中尤为严重的是土地和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使生活的空间与时间超出了当时当地的环境容量。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垄断投机，以及人口分布与生产发展的无政府状态，是极难医治城市规划痼疾的。但战后人民群众为改变环境、改善生活，对垄断财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财富亦不断增长，更因垄断资本与国家机器日趋溶合，大量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采取政府资助等有力措施和制定适应时宜的城市建设法令政策，为有计划地改进大城市规划结构作了大量的工作。

下面就国外大都市规划结构的演变，总结几点对我国大都市改建值得参考的主要经验：

一、调整大都市规划结构必须从区域规划入手

法国为了调整巴黎总体规划，曾进行过局部地区的区域规划，但结果仍无法控制巴黎地区的膨胀，未能解决全国很多地区人口急剧下降，农业地区衰落和煤炭工业地区的不景气景象。近年来法国政府从制订全国范围的区域规划入手，对全国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实施了“平衡发展法”。在全面考虑生产力配置的基础上，限制巴黎地区人口（到1985年不超过预计的1200万人）和工业的发展，疏散巴黎的经济活动，制定移民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八个都市区，并以马赛为重点，作为巴黎的主要平衡区。同时通过发展中小城市，开发经济落后地区以疏解巴黎的人口与经济压力。

美国为了调整东部地区各大都市的总体规划，进行了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直至华盛顿的大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规划。这是另一种形式与规模的区域规划。它北起缅因州，中经宾夕法尼亚州，南到弗吉尼亚州，包括上述五大都市以及附近的二百个中小城市。这个区域是从独立初期开始建设的，后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之间有的已相互蔓延，有的已几乎连成一片。为进行个别大都市的规划调整，必须从城市连绵区的全局加以综合平衡。欧洲、日本等国亦相应地进行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大都市连绵区规划。

我国五、六十年代曾进行过若干重点地区的区域规划，对从经济地理的全局来指导某些大都市的规划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六、七十年代这项工作曾经中断。现正应总结我国五、六十年代以及国外的某些有益经验，认真地进行各种类型的区域规划。在此基础上，调整各大都市的总体规划。例如天津市总体规划，作为首都门户，作为京津唐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华北地区经济中心，必须从区域规划的角度来规定天津市的城市性质、规模与工业、外贸、

文教科研等企事业单位的布点，并应注意控制和避免北京和天津的连片发展。

二、大都市规划结构从单核心同心圆布局发展到多核心 组群式布局，并充分利用地下、空中或水上空间

四十年代中期制订的大伦敦规划采用的是单核心同心圆规划结构。当时被纳入大伦敦地区的面积为 6700 平方公里，人口为 1000 万人。规划从伦敦密集地区迁出工业和迁出人口 1033000 人。它的规划结构（图 1）是由内而外划分为四个层圈（内圈、近郊圈、绿带圈与外圈）的单核心同心圆布局。内圈为城市旧区，人口与建筑密集，拟迁出人口 415000 人。近郊圈空地尽量绿化，以弥补内圈绿地之不足。绿带圈为一宽约 8 公里的绿化地带。外圈位于离伦敦城市中心约 30~60 公里范围内，主要用以疏散伦敦郡过剩人口与工业企业。规划设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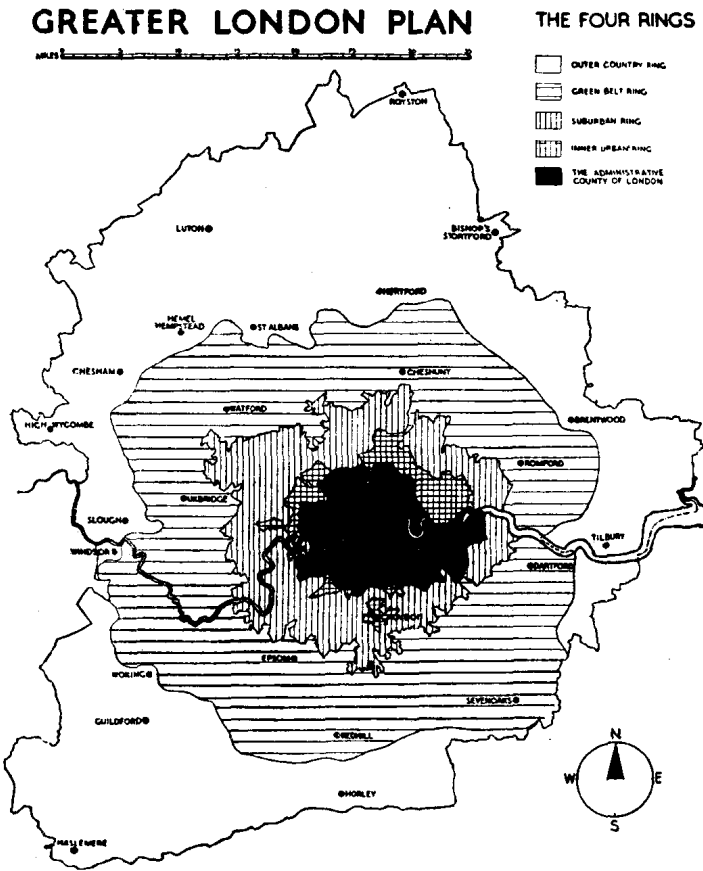


图 1 大伦敦的规划结构

8 个卫星城，可安置迁入 50 万人口。大伦敦规划的交通组织（图 2）按单核心同心圆布局采用由五条同心环路与十条放射路组成的放射同心环直交的交通网。

这种单核心同心圆规划结构在其后几十年的实践中，曾出现不少问题。一是未能控制整个大伦敦地区人口的继续增长。二是中心区白天人口非但未减而反有增长，大量居民每天化一小时以上时间走五、六十公里路程去伦敦中心区上班。三是于伦敦周围建设新城没能达到原计划疏散人口的目的，30 年来周围新城共吸收 50 万人口，但只占伦敦迁出总人口的不到 5%，95% 新城人口来自外地，反而使伦敦周围人口增加。四是距市中心 3~10 公里的环形地区内，环形和放射路上的交通负荷不断增长，且放射环状干道系统实践效果不佳，接近城市边缘而不进入伦敦中心区的车辆是不多的。五是地铁和快速交通延伸至郊区后，站线周围又自发地建起了大批成排房屋，使城市的无计划扩展无法制止。

1961 年公布、1971 年批准的莫斯科总图第三稿（图 3）改变了这种单核心同心圆规划结构而采用了多核心规划布局。莫斯科除第一个卫星城泽林诺格勒已进行修建外，已放弃周围建立卫星城的方针。新的莫斯科总图规划人口 800 万，把公路环以内 875 平方公里用地从规划结构上划分为八个规划片（图 4）。克里姆林、红场所在地是核心片，其余七片环绕四周，